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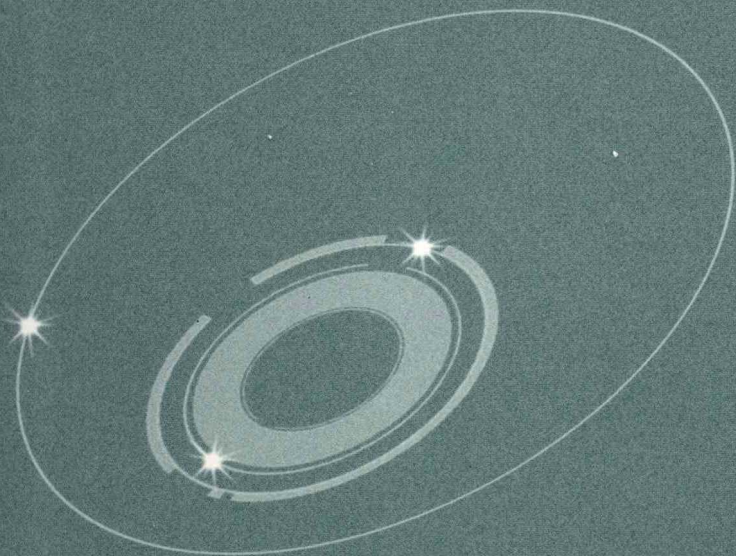


秘书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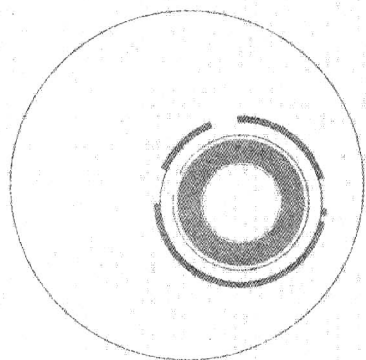
独特的管理辅助系统

MISHU XITONG: DUTE DE GUANLI FUZHU XITONG

钱世荣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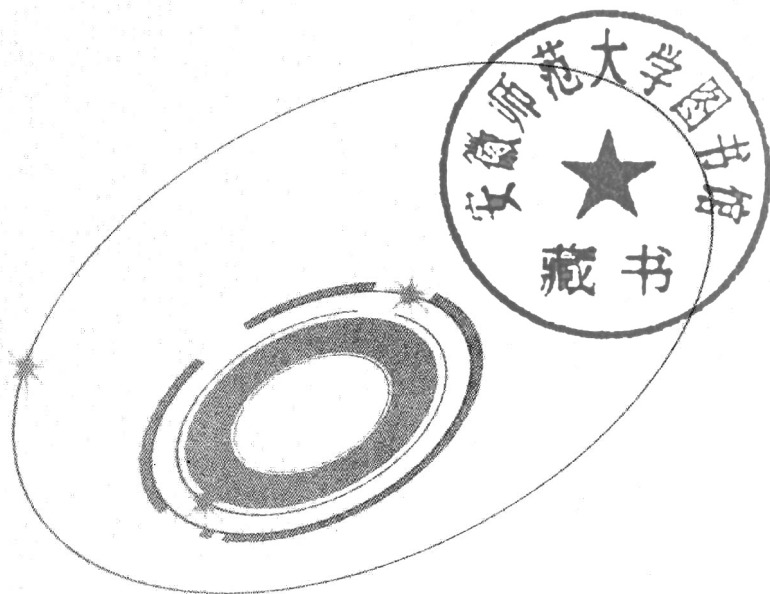


秘书系统：

独特的管理辅助系统

MISHU XITONG: DUTE DE GUANLI FUZHU XITONG

钱世荣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书系统:独特的管理辅助系统 / 钱世荣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7
ISBN 978-7-81110-488-2

I. 秘... II. 钱... III. 秘书学—理论研究
IV. C93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9615 号

秘书系统:独特的管理辅助系统

钱世荣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551-5108348 发行部 0551-5107716	开本	710×1000 1/16
E-mail	leizh@ah.edu.cn	印张	27
责任编辑	高兴 钟蕾	字数	412千
封面设计	孟献辉	版次	2008年7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1110-488-2

定价:40.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一位学者的探索轨迹

——访“管理辅助系统”理论首创者钱世荣

(代序)

《当代秘书论坛》特约记者

记者:近十多年来,差不多每年都能读到您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秘书学研究论作,不少论作影响很大;尤其是您首创的“管理辅助系统”理论,格外引人注目。可以先简要回顾一下您的研究历程吗?

钱世荣:我很认同多年切磋中您的一个说法:我的研究,的确是“随秘书学起步而起步,随秘书学发展而发展”。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虽然也主持秘书专业建设、主讲秘书学课程、编写秘书学教材、参与秘书学界活动,虽然也有一些独到的体会和认识,但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并不多,独创而自成体系的东西更没有——可以说是“三十而立”在秘书学研究上却几无所立。20世纪90年代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因为实实在在做了几年秘书工作,有了比较深切的体验和感悟,也有了比较系统的理性思考,并有计划地研究了一些课题、发表了一批作品,奠定了至今仍是我研究基础(也是“管理辅助系统”理论“基石”)的东西——可以说是“四十不惑”而潜心解“惑”。21世纪以来则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到目前为止的研究重心,是互有联系的“管理辅助系统”理论的反思整合与秘书学学科发展——这可以说是“五十知天命”而再求“新知”吧。

记者:您很善于概括。下面咱们分话题谈。

话题 1:“管理辅助系统”

记者:先对“管理辅助系统”作个普及性阐释,好不好?

钱世荣:好的。“管理辅助系统”有广、狭两义:狭义“管理辅助系统”,就是我们常说的“秘书系统”。它的基本特征是:以所属管理系统内的领导活动为直接辅助对象,以信息汇集与处理、工作运筹与协调、决策督查与反馈、琐务处置与办理为基本活动内容,对所属管理系统内的领导活动进行全程、综合辅助。广义“管理辅助系统”除“秘书系统”外,还包括“管理咨询系统”、“管理监督系统”、“管理保障系统”,它们都是管理系统的子系统。

记者:讲“秘书系统”,大家都耳熟能详。为什么要改称为狭义“管理辅助系统”?

钱世荣:这有两个直接原因:第一,“秘书系统”虽耳熟能详,但同行们研究了20多年都界定不清,这就是问题——问题就在于没能真正把握它的“管理辅助”属性。第二,“秘书系统”是“俗称”,所以它与其它管理子系统的名称不匹配;“管理辅助系统”是“学名”,所以它与其它管理子系统的名称很匹配。进行科学研究,是不是应该尽可能地用“学名”?

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我在相关论作中多次阐述的——“秘书学”因学科名称不规范、学科研究原则有缺陷而带来的种种理论困惑和现实困境。

记者:我是“无疑而问”。我赞同您的看法:其一,目前不但没有产生与广义“管理辅助系统”相对应的“管理辅助学”,而且已经或正在形成与管理咨询系统、管理监督系统、管理保障系统相对应的管理咨询学(即“咨询学”)、管理监督学、管理保障学;所以“管理辅助学”只能与狭义“管理辅助系统”相对应。也就是说,所谓“秘书学”,其实应该称之为“管理辅助学”。其二,从作为一般词语意义的“辅助”,到作为专业术语(尤其是范式)意义的“辅助”;从目前“客观存在”的“秘书学”,到科学规范的“管理辅助学”,总得有个过程。其三,“秘书系统”即狭义“管理辅助系统”,但至少就目前而言,“管理辅助系统”理论只是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秘书系统”理论;也就是说,并非现有的“秘书系统”理论都可以称之为“管理辅助系统”理论……下面集中谈谈同行们很关注的这种具有范式意义的“管理辅助系统”理论的构建。您什

么时候对“管理辅助系统”有了最初的认识?

钱世荣:1986年。那一年中国高等院校秘书学教学研究会在哈尔滨召开年会,我提交了我的第一篇秘书学研究论文——《秘书部门职能论》。在这篇论文中,我认为“就本质言,秘书部门是其所从属的管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虽然这个子系统带有其它子系统所没有的附着性。因此,就本质言,所谓‘秘书部门职能’也就是指它的管理功能,虽然这种管理功能带有其特定的辅助性”。

记者:这应该是“管理辅助系统”理论的萌芽了……与会者们注意到这一点了吗?

钱世荣:与会者们注意到了这篇当时还是油印的论文。从有些与会者此后所发表的论文看,这篇论文把“决策过程”划分为“决策工作前”、“决策工作中”、“决策工作后”这样三个阶段的阐述,以及秘书部门在这三个阶段的“辅助”的阐述,都先后被借鉴。但实事求是地说,多数研究者并没太在意“管理子系统”的说法。因为,这篇论文主要从“秘书部门所从属的管理系统结构以及该子系统的管理过程”入手,来研究它的职能;尽管已经说到“秘书部门的各项职能是完整的统一体。其统一,就统一于它在所从属的管理系统结构中的辅助地位和管理过程中的辅助性管理功能上;从根本上说,统一于它所从属的管理系统的特定组织目标上”。但限于主客观条件,毕竟没有就“管理系统”、“管理辅助系统”进行专门研究。那时候,秘书学研究者们对管理学理论的确是知之有限。

记者:您的这一“理论萌芽”是怎样继续“生长”的?

钱世荣:在撰写《秘书部门职能论》过程中,我就意识到:要研究清楚秘书部门这个“管理子系统”,不能不研究它“所从属的管理系统”。这促使我在此后的考察和思考中,比较注意探究秘书部门和它“所从属的管理系统”及其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也有意识地研读了一些当时能搜罗到的管理学、行政学、领导学等方面著作。因为现代管理系统在我国发育得比较晚,当时能搜罗到的管理学、领导学著作,基本上没有研究“秘书”的内容,行政学著作关于“幕僚机关”的研究也不多(有些还是从秘书学研究中移植过来的),再加上自身的研究条件非常

有限,所以“萌芽”之后的“生长”非常缓慢。在这一缓慢“生长”过程中,我在《当代秘书学研究的范式选择》中所概述的弥散的“知识散点”,对我起着潜移默化的滋养作用。

较为快速的“生长”是在我研究的第二阶段。我在有关论作中有过阐述:主要是从互有联系的“活动论”和“学科论”这两个方面展开的,具体路径是“秘书纵向分层”、“秘书功能”、“秘书行为与领导行为关系”、“秘书学科学定位”、“秘书学核心理论”、“秘书学学科问题”、“秘书学学科发展”这些课题的系列研究及其拓展性研究。这些研究让我越来越清晰地触摸到有特定内涵的“辅助”这个“核”,并以此为中心范畴初步勾勒了这个独特的“管理辅助系统”的“系统结构”理论、“系统功能”理论、“主辅系统”理论、“学科定位”理论、“学科核心”理论,再由此探讨学科对象、体系、类型、归属、名称等“学科问题”和学科研究状况、方向等“学科发展”问题。我后来在《秘书学学科对象问题再探讨》中所概括的12个“理论要点”,这一阶段差不多都形成了;我后来在《当代秘书学研究的范式选择》中所阐述的“管理辅助活动范式”的研究理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这时也基本形成了。

记者:这的确是奠定您研究基础的重要阶段,也是“管理辅助系统”理论形成的重要阶段。

钱世荣:是的。所以到第三阶段,我的研究就稍稍有点儿“底气”了:像您亲自“点”的或我们反复切磋的《我国21世纪秘书学理论研究方向》、《中国秘书的转型与发展》、《变与不变:入世与中国秘书工作发展》、《中国当代秘书学研究:第三次爬坡》这样的大题目,我才敢“接”;像《〈中图法〉的定位与秘书学的突破》、《知识辅助:21世纪秘书工作的新内涵》这样跨学科的“选题”,我才敢“啃”;思考多年的《当代秘书学研究的范式选择》这一“高难度动作”,也在同仁们的激励下勇敢地去“做”了。当然,这一阶段的研究还是“如履薄冰”——不只是由于研究环境“窘迫”、研究难度同步增长,主要是主观上仍力图继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并试图将“发现”、“创造”更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这一阶段的理论推进:一是通过对知识经济、“入世”背景下有特

定内涵的“管理辅助活动”的跟踪、预测研究,来揭示狭义“管理辅助”的新内涵、新要求。二是对“管理辅助系统”既已形成的阶段性理论进行反思性整合。其中不仅把“领导工作辅助系统”、“‘辅助领导’系统”、“辅助系统”这些阶段性的“提法”,改称为与“管理决策系统”、“管理咨询系统”相对应的狭义“管理辅助系统”;把“‘辅助领导’活动”、“辅助活动”,改称为与“管理决策活动”、“管理咨询活动”相对应的狭义“管理辅助活动”;而且,有意识地以“秘书系统”和“管理辅助系统”这两套“话语”兼用的方式,来促进前者向后者的转换(这一点,只要留心一下《秘书学学科体系研究》、《秘书学学科建设的基本策略》所构建的“学科体系”,和《管理辅助系统论纲》所构建的“基本理论体系”,推敲一下《秘书系统:独特的管理辅助系统》这本专著的书名与全书结构,就不难“悠然心会”)。三是连续多年以年度述评的方式,来丰富对学科发展状况、学科自身理论的认识,并由此对“学科发展”战略与策略作深层次的思考——其中贵刊以大版面“专题”形式推出的《中国当代秘书学研究:第三次爬坡》、《当代秘书学研究的范式选择》,就是这种深层次思考的产物。

记 者:这两篇大作的价值和反响,稍后我们将集中谈……我注意到:“管理辅助系统”理论在形成过程中,就受到学科内外同仁广泛关注并被借鉴引用。邱惠德先生认为您“将秘书辅助系统‘提升’为管理系统子系统,不仅客观解决了争论多年的秘书学学科归属问题,更重要的是科学地解决了秘书学的科学地位问题,并进而能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刻的层面去探求秘书学理论与实践问题”,并强调“承认管理辅助系统的客观存在,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管理职能的内在本质和决策、执行、反馈和监督系统的全貌”。这些评价都很中肯。您自己怎么评价“管理辅助系统”理论构建目前已经达到的水平?

钱世荣:这还是由别人评价吧……当然,也不妨说说自己的看法。可不可以这么说:基础已经打好,框架已经构建,只要有更多的投入,“大厦”一期工程的完成不会遥遥无期。关键在于:有更多的研究者能“与时俱进”地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在困难与诱惑的夹缝里“净心、恒志、谋和、求实”……

话题 2:“第三次爬坡”

记者:“学科发展”理论是“管理辅助系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再集中谈谈“反响强烈”的《中国当代秘书学研究:第三次爬坡》。

约这篇稿子之前,我省秘书界、秘书学界就当时的秘书学研究是否处于“低潮”有过深入的讨论。在多次切磋中,你我所使用的“态势语”都是“低潮(落潮)”与“高潮(涨潮)”,您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把“态势语”改成了“滑坡”与“爬坡”?另外,我们本想先集中讨论秘书学研究何以陷入“低潮”,再集中讨论秘书学研究如何走出“低潮”,您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合二为一”并更多地着眼于“第三次爬坡”?

钱世荣:先说明一点:《中国当代秘书学研究:第三次爬坡》所使用的“态势语”是“滑落”与“爬坡”,用“滑落”而不用“滑坡”,意在避免产生理解上的歧义。后来同行们习惯将“滑坡”、“爬坡”对举,考虑到“滑落”、“滑坡”虽有细微差别,但比喻义一致,我也就“从众”了。

回答您提出的两个问题:

“低潮(落潮)”与“高潮(涨潮)”、“滑坡”与“爬坡”,其比喻义也没有实质性差别。之所以改成“滑坡”与“爬坡”:考虑之一,是“低潮(落潮)”与“高潮(涨潮)”容易让人更多地联想到“外力”作用而忽略“内因”(有研究者在近期的论争中还套用档案学研究的“说法”,强调秘书学专业建设第二次“滑坡”的“直接原因是‘行政力’的外因所致”,可以算作一例),而研究结果表明:两次“爬坡”的滑落,自有其外部原因,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考虑之二,就是我在《两次“滑坡”问题再探讨》中所说的:“更能体现主体能动性”,更能揭示“发展曲线由低升高的内在动力”。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如果按原计划先集中讨论秘书学研究何以陷入“低潮”,再集中讨论秘书学研究如何走出“低潮”,可能更有利于达到预期目标。但研究者也会被所研究的“事实”及其规律左右:其一,感受性总是先于或重要于思想的表达。当时的秘书学研究处于

“低潮”，可以说不仅是贵省而且是全国秘书界、秘书学界绝大多数同仁共有的感受。而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感受与客观事实是吻合的，论证起来并不十分困难。所以，我的看法同你们一样：这显然不是讨论的重点。其二，秘书学研究何以陷入“低潮”？自然很有必要加以科学总结，但多数同仁“心里有谱”，探究起来也并不十分复杂。其三，在研究中，我发现了“‘高潮(涨潮)’中有‘泡沫’，‘低潮(落潮)’中有‘涌动’”，“‘滑坡’与‘爬坡’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这一事实，发现了“‘涌动’是发展曲线由低升高的内在动力”这一客观规律，这不能不使我更多地关注、思考这一事实和规律，尤其是更多地关注、思考当下我们必须正视的重大现实问题。这样，这篇论作最初的论题就是“低潮中的涌动”，其后又相继调整为“低谷与爬坡”、“中国当代秘书学研究：第三次爬坡”。这可以解答您的第二个问题吗？

记者：现在看来，《中国当代秘书学研究：第三次爬坡》之所以“反响强烈”，并得到绝大多数同仁的肯定，可能恰恰就在于您前瞻性地“合二为一”，并更多地着眼于“第三次爬坡”……这么一调整，研究和写作的难度也增加了吧？

钱世荣：是的。这篇论作的“引子”(第一部分)虽然仅占全篇四分之一，却花去全篇研究与写作三分之二的的时间。其费神费力之处，主要在评价指标的确立、史实的梳理辨识、数据的统计分析、发展规律的把握等。另外，“第一次滑坡”的确认，也远比“第二次滑坡”的判断费时费力得多。因为年代毕竟稍远了些，数据的统计分析要困难得多。我对“研究投入”、“研究产出”、“成果影响”的逐年统计分析、专题分析和发展曲线绘制所花费的时间，也远远多于论作的写作时间。有个细节您应该有印象：在贵刊的多次约稿中，惟有这篇约稿我没能按期交稿……

记者：有印象。不过，“慢功出细活”嘛；更何况您夜以继日，做得还不算慢……虽然“三次爬坡”还需要做更细致的拓展性研究，但这篇论作对“三次爬坡”主题的概括很准确，发展曲线的勾勒很有价值，对“第三次爬坡”四个不利条件、两个有利条件的分析很精辟，对如何“在科学的整体联系中寻求秘书学的发展”的阐述也开人眼界，具有重

要引导作用。总之,“第三次爬坡”并非主观号召,而是客观趋势揭示,是揭示客观趋势而“因势利导”,以促进秘书学研究的发展,这是绝大多数同仁一致的评价。它在中国当代秘书学研究发展史上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充分地被人们认识。

咱们接着谈“我国当代秘书学研究‘第三次爬坡’应努力攻克的一大难关”——“范式选择”问题。您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一问题的?

钱世荣: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我20世纪80年代就初读过。1992年,王千弓先生提出地域性“学术群落”问题,这当然还不是“范式”问题,两年后却引发了刘翔飞先生对“秘书学理论研究的两个群落”的探讨。刘先生认为:“学术群落不应单纯地按地域的自然分布划分,而应按其形成的社会基础,所持的基本观点,研究的总体方向和趋势作为划分的标准”。其中的分析虽没出现“范式”字样,但实际上已经涉及“范式”问题。1995~1996年,我在《秘书学科学定位研究》中也探讨过“两大研究群体研究侧重点的差异”,但并没有认定“两个群落”就是“两种范式”:原因之一,当时仅有“秘书工作范式”已基本形成,“秘书活动范式”尚在形成中,“管理辅助活动范式”则刚刚步入“理论创建阶段”,各家差异明显,但“对立”或“对抗”并不十分严重,所以关注得比较多的是彼此的“沟通”。原因之二,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主要是就常规科学而言的,当时的秘书学“正日益临近由前科学向常规科学转化的界点”,是否存在“范式”问题还需要审慎研究。

基本认定当代秘书学研究存在“范式”差异,是在“双线规律问题”、“学科对象问题”论争之后。前面我说了,那时“管理辅助活动范式”的研究理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已基本形成,当代秘书学研究三大范式的差异乃至对立已相当明显;在对这“三大范式”的具体研究和对托马斯·库恩晚期学术观点的研读中,我也拓展出这样的认识:“在前科学阶段,诸范式及‘准范式’纷争,统一范式尚未形成;所以,要尽力使争论中的某一理论取得绝对优势,形成主导范式”。因此,在总结“三次爬坡”的“成果和经验”时,我作出了如下阐述:“学科对象的表述虽有种种不同,但实际的研究指向(尤其是对对象的基本部位)并无太大的差异,需要进一步努力的仅仅是‘研究范式’的转换、学科名称的规

范和学科归属的确认。”这算是正式提出了“范式”问题(其中“转换”是各学科的“通用语”)。

记者:为什么仅仅是“提出”,而不是按原计划作为《中国当代秘书学研究:第三次爬坡》第三部分的基本内容,这原因您在《两次“滑坡”问题再探讨》中已经讲得很清楚;2002年9月在“‘华人杯’21世纪秘书工作理论研讨会”上,您简要阐述了“范式”问题,并讲到公开讨论这一问题的两点“为难之处”(必然要涉及对前辈研究成果的评价,必然要涉及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评价),与会者也记忆犹新。我感兴趣的是:一年后您公开发表《当代秘书学研究的范式选择》时,把各学科的通用语“范式转换”改成“范式选择”,这应该有特殊的考虑吧?

钱世荣:是的。一方面,“研究范式制约着学科发展方向和理论研究成果品位,影响着秘书专业教育、秘书工作实践的发展,如何选择适宜的主导范式,是秘书学进一步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理论研究者,我有责任把它提出来、讲清楚;另一方面,我不能不考虑秘书学不同范式研究者的心理接受程度,同时也觉得改用“范式选择”更符合秘书学研究的实际情况。“范式选择”问题终于能够公开提出来,应该感谢诸多同仁的理解与鼓励,应该感谢刘翔飞、邱惠德、何宝梅、马守君等同仁的同步研究,尤其应该感谢贵刊及相关专业期刊一如既往的鼎助。

记者:都是同行,都是为了秘书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心有灵犀”嘛;我跟你说过:我们的编辑和读者都很欣赏您敏锐的创新思维和严谨晓畅的表达。……您怎么看个别研究者对“两次滑坡”问题、“范式选择”问题的不同意见?

钱世荣:有不同意见很正常。“科学史提醒我们,一个理论的价值往往在滞后一段时间内才被人充分认识”嘛。更何况,有这些不同意见,不也恰恰证明了“范式”问题的客观存在和“范式选择”的必要?学术论争是推进学术研究发展的有效形式,“管理辅助系统”理论不也是在学术论争中发展起来的?当然了,在“双线规律问题”、“学科对象问题”、“民间秘书问题”、“两次滑坡问题”、“范式选择问题”的论争中,几位研究者接二连三地出现较为相似的“失范”乃至“失态”现象,其中一些问题被《当代秘书学研究的范式选择》不幸而言中,这值得探究。

话题 3:“艰难推进”

记者:作为这次访谈的结语,这个话题我们简略聊聊。

“学科发展”仍是全国秘书界、秘书学界关注的“前沿问题”,也是您多年来研究的重心,有影响的著述不少。我注意到,您除了不断多方面的前沿成果来丰富学科宝库,就“学科发展研究”本身来说,您关注的主要是发展方向、基本任务、研究重点、主客观条件等。可以就上述内容作一个简要概括吗?

钱世荣:试试吧。

我国 21 世纪秘书学理论研究的方向是:以基础理论研究为重点,注意应用理论、技术理论、交叉理论研究的协调发展,促成秘书学向作为常规科学的管理辅助学的转化。具体地说:在研究的整体布局上,要坚持以基础理论研究为重点;在应用理论研究层面,要注重经验研究向理论研究的提升;在技术理论研究层面,要寻求辅助决策技术、辅助协调技术、辅助督查技术研究的先行突破;在交叉理论研究层面,要着力于辅助与社会的关系、现代辅助人格的研究。

秘书学研究空间极其宽广,研究者应善于总揽研究全局,善于根据自身所拥有或所能拥有的优势资源选准恰当的研究方位。秘书学研究值得关注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应善于在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上抓准重大现实问题。秘书学研究任重道远,研究者应善于修炼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品格。这些品格包括:第一,要善于以终极关怀为最高研究视点。即善于从“具象的事—抽象的理—鲜活的人”,能更多地关注秘书工作者的境遇与发展,更多地探索并理解这一特定“人群”的活动价值。第二,要善于积聚并提升真切的实践体验。应明白感受性总是先于并重要于思想的表达,理论研究的贫乏无力,在很大程度上与缺乏切身感受有关;同时,应重视对实践体验作应有的理论概括。第三,要善于储备和融通多学科知识。应重视哲、史、文根基和对科学学、管理学、领导学等相关理论的细致研究,真正吃透与研究课题有关的科学知识,并在知识的碰撞、融合中创造新知。第四,要善于创新。

秘书学研究有“三难”，一是可直接借鉴的知识成果非常有限，二是数千年文化积淀斑驳陆离、极易陷入传统旧观念的泥淖，三是世界各国秘书活动差异大变数多、需要作超越时空的总体把握。所以，研究者应勇于否定旧思想、旧事物，敏于认同新思想、新事物，长于综合各种信息，乐于探索未知领域。第五，要善于保持恒、净、和、实的研究心态。“恒”，即持之以恒；“净”，即不为时弊所惑，不为名利所扰，有建树之心而无捷取之念，有孜孜之态而无蝇营之举；“和”，即善切磋善合作；“实”，即重视国情，关注社会发展变化，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理论与实际问题。

要继续重视对秘书学研究的有效组织：要强化规划力度——筹集研究基金，制订“研究指南”，组织项目申报，加强学术研究指导。要有效整合资源——整合研究力量资源，继续促进不同地域、不同岗位、不同个性研究者、活动者的精诚合作，培养造就确保研究活动“可持续发展”的合理梯队；整合研究文献资源，协助现有电子数据库充实、完善秘书学研究文献，推进秘书学研究专门数据库的建设；整合政府政策以及教育、宣传、新闻、出版单位和企业、相关社团等社会资源，适时组织或参与组织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大型活动。要持续推出研究成果——组织编写体现新理念、适应新需要、足以成为“专业名片”的系列教材，资助出版代表本学科前沿水平、足以成为“学科名片”的学术专著，编辑出版具有较高学术水准、足以成为“学科形象标识”的《中国秘书》或《管理辅助系统》，并按学界通行的学术评价标准多渠道、多形式地推介本学科的新人新作。

记者：需要做的事情真是不少。借用您的口头禅：“知易行难，行则不难。”也推介一下您的“研究经验”：学习邓小平，先把“特区”建设起来再说。能透露一点儿您个人的“下一步”吗？

钱世荣：虽然出版学术专著很困难，还是争取把《秘书系统：独特的管理辅助系统》这本学术专著出出来，以不辜负诸多同仁的期望，也算是对自己多年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更把它作为一个“研究平台”——在此基础上开始《管理辅助系统论纲》这本专著的写作。当然，还会“在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上”选择一些合适的课题来研究。

记者:情不自禁地想起您的文化散文《武陵源思绪》,想起其中这样一段真情道白:“且让我日渐稀疏的头发,与你们的银发、灰发、黑发一起在晚风中飞扬,一如峰顶的绿色植物,在凝重的霞光中飞扬出生命的活力,飞扬成天地间新的风景……”

钱世荣:是啊,“当你以全部心智和才力终于艰难地洞穿这一切,终于跋涉到豁然开朗的‘水绕四门’时,你无比畅快地呼吸着的,究竟是什么?”——美丽的武陵源给人的感悟真是多方面的,珍视这大自然的启迪吧!

原载《当代秘书论坛》2006年第3、4期
《秘书战线》2007年第1、2期转载

目 录

一位学者的探索轨迹(代序)	1
---------------------	---

第一方阵 系统观

系统结构:秘书纵向分层研究	3
秘书的纵向分层与秘书功能的有效发挥	3
技术操作层秘书的兴起及影响	9
行政执行层秘书的第三种流向	12
处于决策圈边缘的决策助理层秘书	14
多能化与秘书纵向分层	16
两种类型秘书的职等差	18
系统功能:秘书功能研究	21
秘书的功能	21
秘书的参谋功能	25
秘书的监督作用	30
主辅系统:秘书行为与领导行为关系研究	32
敬凉帮:领导者与秘书的关系准则	32
现代领导者用秘书的要诀	41
正确认识秘书与领导者的关系	43

第二方阵 系统之科学

科学结构:秘书学科学定位研究	49
秘书学:研究“辅助领导”活动规律的科学 ——秘书学在科学学科结构中的定位	49
秘书学:以学科常态衍生分布的科学	

——秘书学在科学形态结构中的定位	53
秘书学:临近常规科学界点的科学	
——秘书学在科学演化结构中的定位	56
科学核心:秘书学核心理论研究	60
秘书学核心理论的“核”	60
秘书学核心理论的“心”	63
秘书学核心理论的构成	64
秘书学核心理论的价值	69
科学问题:秘书学学科问题研究	72
秘书学学科对象问题再探讨	72
秘书学学科体系研究	85
秘书学学科体系的科学特性	91
秘书学学科类型辨析	97
秘书学专业的归属、名称与结构	100
科学发展:秘书学学科发展研究	106
我国秘书学理论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106
我国 21 世纪秘书学理论研究的方向	110
秘书学基础理论研究	115
秘书学研究状况的结构分析	121
《中图法》的定位与秘书学的突破	124
中国当代秘书学研究:第三次爬坡	129
当代秘书学研究的范式选择	141

第三方阵 系统研究之拓展

主体变奏:第一方阵研究之拓展(上)	159
“秘书新闻”与秘书的社会类型化	159
认识秘书的三个误区	163
虚功效与辅助决策	165